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切入、逻辑与中国化

——评陈世华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

**The Entry, Logic and Siniciz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Book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ommunication in
North America* by Chen Shihua**

◎ 李铁锤 陈艳辉

Li Tiechui Chen Yanhui

摘要:《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系青年学者陈世华教授沉潜十年研究所得。该书前身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并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全书16章共40万字,以知识谱系的写法清晰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内涵、分支以及发展,分析了由其衍生出的电影政治经济学、新闻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广告政治经济学等亚研究领域,追踪了其与种族研究、女性主义、民族志、文化研究等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的各种跨学科取向和路径。其理论精髓是“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其元理论是“传播即控制”,反映了话语权力关系和博弈,对中国传播业以及传播研究,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切入点,中国化

Abstract: The book *Research on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ommunication in North America* is a research result of ten-years study by Chen Shihua, a young Scholar. The predecessor of this book is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which has won the title of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Hubei Province and the Nomination Award of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China. It has sixteen chapters, totaling 400,000 words. This book combs the origin, connotation, branches and expan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learly. Meanwhile, it analyses sub-research field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film,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s,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e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advertising by means of knowledge genealogy, and also elaborates various interdisciplinary orientations and paths including racial research, feminism, ethnograph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ssence of its theory is “our unfree communication”, and its meta-theory

is “communication is control”, which reflects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games of discourse. It has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ommunication, entry point, sinicization

在现代新闻传播业产生之后,传播与政治经济开始融合在一起并演化出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传播与政治经济相互制约又各自独立,但有强弱之分;二是政治掌控经济进而一起掌控传播。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后一种形式。因此,从三者的关系入手研究传播现象既必要又能抓住本质问题。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虽经过六十多年的学术发展,如今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但依然处于非主流地位,在我国相关研究更是阙如,这与传播、政治、经济三者的紧密联系极不相称。青年学者陈世华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以知识谱系的结构围绕“我们不自由的传播”这一主线,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渊源、内涵、分支、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有着清晰的梳理与评判,并依据冯友兰的“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研究理念撰写论著。第一,该书改善了该学科“照着讲”西方相关传播理论的薄弱现状。国内融会贯通地掌握传播学批判理论,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师很少,亦缺乏深入“照着讲”的专著,这是我国学术研究及课堂教学需要却至今难以完善的短板。第二,该书进行了“接着讲”的有益尝试并展示出很好的“接着讲”能力,对理论的消化吸收与学术延伸皆属上乘。第三,作者在国内极少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开始了个人持久性的关注及研究,该著作属于“独自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成果,没有他者参与,保证了思考的深度与对学术的敬畏心态,有助于在理论消化基础上进一步开启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着讲”的进程。

我国有传播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的土壤,三者之间显性或隐性的复杂相互关系。在新媒体时代技术混合的情况下,政治如何影响经济与传播并以何种形式呈现、发展,也是未来该方向的研究主题。《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对上述问题皆有所思考。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新求变,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①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在借鉴中学会独立说话,又要立足本土的社会事实与社会现象。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引进与中国化,要依托三者之间呈现的状态及事实进行拓展与深入,培育理论自觉意识与能力。

^① 彭国翔.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5.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切入口及其研究逻辑

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近年来在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上,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常套用语言学、符号学、话语批评等来阐释新闻事件或现象,该方面的论著多有故弄玄虚与肤浅套用之嫌,且缺乏理论自觉;其二,从文化研究、批判理论、社会学等角度来分析新闻事实及新闻现象,多陷入理论“硬借”与阐释表层化窠臼。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切入口的学术研究一直较少。

(一)传播、政治、经济三者无法分割的关系

文艺复兴后理性与人本身的解放,带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后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新闻传播业的繁荣使传播与政治经济在业务以及学术上产生了无法分割的关系。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产物,权力无处不在,在许多情况下,一个“言语—行动”就是“制度性的行动”(institutional act),它之所以被倾听、被相信、被服从、被回应,完全是因为它被相关的机构“授权”了。^①而新闻传播业十分符合这一事实,这也是万物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新闻传播实务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可能受二者制约甚至控制,但话语并不一定会对权力“俯首帖耳”,也可能被当作抵抗的策略和工具,^②因而在学术上无法忽视对它的研究,如:马克思关于新闻传播的观点,阿尔都塞对传播与意识形态的研究,葛兰西分析了传播中的文化霸权问题,马尔库塞提出了传播对人的单向度塑造,达拉斯·斯麦兹与席勒一起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虽然该领域的研究依旧边缘。

在西方,传播主要受经济控制,同时经济又与政治相互控制进而一起制约传播内容,我国则属于“一种通过国家主导发展和国家控制社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③。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彼得·格雷厄姆(Peter Graham)指出:“如果深层次的社会财富和分配的权力结构不改变,那么信息社会的社交媒体无论多么繁荣,(反映的)都只是交往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④在权力起绝对作用的制度下,社会权力结构直接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与方式,经济则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平衡

① 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第1版[M].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② FOUCAULT 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0:11.

③ 曹晋.导论[M]//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④ 曹晋.导论[M]//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政治与传播关系的力量,其既可以影响政治进而采取对应的传播内容与方式,也可以与传播结合起来影响政策。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技术因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之中,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思考方式、信息传播的方式及其边界,如“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人类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①。网络如今已成为影响三者关系的重要因素,甚至其本身就是融合了三者的混合体,能够影响社会的诸多方面,如“网络社会”“网民”以及大数据物联网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应该在政治、经济、传播三者之间加入第四者——网络技术。

(二)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切入口及研究逻辑

学问研究的主干容易确定,延伸的枝蔓则是研究者各展其能之处,也是困难丛生之处。在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传播研究应是一个研究主干,作为其分支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过去六十年里给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其对现存政治经济权力和传播体制的批判使它成为传播研究中的异类。尤其是在经验研究占统治地位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处于边缘地位”^②。但这不影响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目的相对清晰,有学者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着重分析传播体系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③。这是以资本为中心点研究西方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传播的方法,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及应如何研究则语焉不详。同样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和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的全球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达拉斯·斯麦兹认为应着重研究垄断资本及其权力对作为公共财产的传播资源的控制。莫斯可(Vincent Mosco)从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三个切入口着手,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认为这个学科应该紧紧基于更广泛的社会统一性分析,研究社会生活的控制

① 伊罗生.群莽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第2版[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②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③ 同①7.

和生存,优先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① 其还强调在研究上要注意结合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从整体研究来看,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缺乏联系社会事实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逻辑上,《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用“知识谱系”结构十分清晰地呈现了该研究分支的脉络、研究上如何切入以及可以使用怎样的研究逻辑,对后来者展开研究大有裨益,如作者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通过研究获得大量史实,服务于现在,理解现实问题,为现实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以史为鉴,预测未来趋势……”。^② 该书对该研究分支的渊源、现状、切入口、研究逻辑以及几个研究的亚领域分支与内外的跨学科取向进行了深入阐述评析,将其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如何“不自由”。作者在该书中亦对相关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外界的评判进行了简明介绍,如:研究界限不清晰,注重宏观的传播制度分析,缺乏微观视角;重视对具体新闻内容和传播过程的研究;一直坚持思辨为主,重视质性的判断,掺杂了一些主观判断,忽视严谨的论证过程,科学性备受质疑;把经济因素视为决定因素等。作者还提出应在坚守研究独立的基础上看待外界的评判,例如重宏观分析是该分支研究的重点与特色,并不是研究上的瑕疵。在崇尚实证量化的当今,作者以思辨统领全书,增强了分析问题的思想深度,“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范式对于传播学的知识拓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质是一种策略性的行政研究,当它的研究模式渐渐成型,知性的活力就渐渐离它远去”^③。在流行用实证研究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时代,确实存在这种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不管从哪一切入口或逻辑展开研究,皆离不开研究权力、经济、意识形态、传播及传播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及表现形态,要做的工作是沿着这一主干找准切入口并深入研究,这是研究的关键。

二、“富土壤”与“贫论著”反差下的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涂尔干认为对社会事实的把握与关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现实。学术研究贵在直呈问题,一应“我心思我见”,善于发现并正视问题,对自己看到的问题深入思考;二应“我手写我心”,因此,既要有学术独立意识,不能离开

①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② 同①8.

③ 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4).

他者的理论观点就不知如何分析问题、撰写论著,亦不应囿于写作时必须要有理论依托、应充分引经据典的惯常观念,此外,要尊重学术规律与自我精神。西方学者多是采取这一研究路径,如与传播学相关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也是我国人文学科研究所依托的理论多来自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复强调行业是“我们的”,而不是垄断着媒介市场的大媒介集团和跨国公司的;主张传播资源是公共财产,应该由民众控制,公众有权参与传播政策的讨论,决定传播工业的发展路径和方式,甚至在内容上起决定性的作用。^①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具有鲜明的公有财产性质与自身管理特色,与西方传媒业有明显区别;政治、经济、传播之间更为紧密地呈现出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进而具备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富土壤”。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贫论著”的情况。传播与政治、经济的紧密联系是新闻传播学者不应该忽视也绕不过去的内容。“新闻无学”观点长期存在,从现实表现而言,确实缺乏内容厚重的理论成果。在媒介化时代,人的信仰、价值观、意见以及对外界的窗口化认知,主要依托新闻传播中介,这就需要也应该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视角来分析传播是如何改变人的观念或造成其异化的,这就上升到了哲思的高度。同时,批判学派一般又被称为第二哲学,这表明其并不属于纯粹的传播学研究范畴,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效弥补该学科学养不足的现状,有助于提高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这一研究视域下“富土壤”与“贫论著”的鲜明对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研究的习惯。从学科研究的历时性而言,对马列主义新闻观“我注六经式”的阐释长期是研究的主流,且学者们形成了“心无旁骛”的研究习惯。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与对事件的政治学解释结合起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决定性意义。^②马克思根据他人学术成果与社会事实进行创造性思辨的做法值得继承,后来的研究者本来可以沿着这一精神以及路径“接着讲”与“对着讲”,对其进行延伸、完善,但问题是后来的研究者或缺乏研究勇气与主动性,或缺乏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理论的拓展而亦步亦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厚重的学术研究路径,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现实却对之关注不够。在“照着讲”上,直到近几年中国才引进西方传播批判学派但未对其进行深入消化,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引入更是缺乏。青年学者陈世华选取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冷领域进行研究,其实是出于一种研究使命的自觉。“政治经济

①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

②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版[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权力对信息生产和流通的控制是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①，因而可以说不对其进行研究就没有抓住研究的主题及本质。

二是缺乏理论自觉意识以及建立理论的自信。理论自觉意识体现为学者具有直呈问题并建构自己对问题的系统认知的意识，而不是言必称西方或言必称先哲。同时，中西体制、社会、文化存在显著差别，我们需要建构自身的理论，理论建构也应依托自身土壤。虽然在新闻业界与学界，常称某某报人或某某学者的新闻思想，但实际上大多没有达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国内依旧缺乏本土化的新闻传播理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具有理论自觉意识，其内容的学术深度与“新闻无学”对比鲜明。“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②人类往往无法对未来的社会进行理想化的预期建构，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言，理想化的建构往往不能通往天堂而是会通向地狱，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既不能囫圇吞枣地借用他者的理论，也不能只凭想象建构理论，而是应该以社会事实为基石，进行研究并顺势形成理论。

三是学术的投机。学术中的投机主要体现在倾向于“智慧”地根据“需要”选择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以及观点，却不愿意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导致难以产生能经得住学术规律考验的理论与内容。这一情况的存在也受中国学者整体性社会性格因素的影响。“社会性格的概念指一个群体共有的性格结构的基体，它假定社会性格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是生活实践，即由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层理构成”^③。传播政治经济学属于批判学派中的“麦芒”，其围绕政治进行批判研究，常遭受来自其他学者的无据批评，而且容易为权力所忌是很多研究者绕开它的主因，他们担心研究的领域边界与语言边界难以掌控。但掌权者必须知晓影响其价值观的威胁与良机，运用新闻传播手段避开威胁，守护良机。换句话说，新闻媒介是社会控制的机构。^④有时候，投机的学术研究以为自身在迎合官方的需求，实则背离了官方的需求，官方要做到“避开威胁、守护良机”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这也是党和政府强调理论自信与自觉的缘由。同时，我国媒体的“喉舌”性质要求建立起从传播、政治、经济、网络技术角度进行深入思辨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①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38.

②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版[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③ 弗洛姆.论不服从:第1版[M].叶安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④ 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第1版[M].黄煜,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脱离实际、进行纯粹玄虚的哲学思辨,这种高度理论化的研究现象也是麦克卢汉一直所反对的传播研究取向。^① 这种研究取向看似有学问,实则学术研究上并非诚心正意,而是浅薄浮躁之举。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政治、经济三者紧密联系并受到技术的影响,我们亟须建构自己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以及有效的传播模式,实现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进而解决长期存在的理论入心、传播入心程度不足的问题。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需要及路径思忖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其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我国无疑需要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其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紧密相关,另外,亦应加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以丰富其理论,毕竟理论指导着现实实践。从传播学研究来看,麦克切斯尼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所有传播学研究的基石,所有的传播学者,不管他的研究领域和特长是什么,都能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中获益。^② 因此,要改变我国相关研究的薄弱现状,除解决前文提到的问题外,还应思考其中国化的原因及中国化的具体研究路径。

(一)建构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分析

1.探索其相互影响机理之需要

现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下三者在不同媒介或介质中所表现出的关系,深入分析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十分缺乏。只有对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进行研究,才能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并指导新闻传播实务。特别是在如今的互联网传播时代,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传播可控难度增大,这就需要上升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高度来深化对这些变化的哲学认知,进而科学理性地对待网络技术给传播带来的影响,做到既不草木皆兵,亦不放任自流。网络技术已经给传播管理者带来了困惑和恐慌。在广播产生以后,广播以匿名的、非个人的媒介取代了具体的、根植于社会的诵经师。广播将人们纳入新的“关系群”(clusters of replationships)的能力,可以被视为潜在的破坏稳定的力量。^③

①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

② 同②113.

③ 拉金.信号与噪音:第1版[M].陈静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政府通过对广播的网络绑定,确定新的信息秩序。如今人们对网络技术的看法与之前人们对广播和电视的看法有类似之处,但网络的难控性以及人类社会无孔不入的渗入远超广播与电视。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高度来研究其运行机理,则可以抓住本源性问题,即传播、政治、经济、网络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机理对管理思维与具体措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梳理评析了电影政治经济学、媒体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广告政治经济学等,对三者在不同介质下的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评判。在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上述内容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主题。

2.建构本土相关理论自觉之需要

政策对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要求,是建构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针与导向标。传播政治经济学应是我国新闻宣传事业的理论基石,科学深入的相关研究能解决当今存在的宣传效果乏力、科学量化管理缺乏理论依据、管理思维缺乏可操作的科学理论指导等问题。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与传播机构结合起来,提出了企业积累的“经济资本”、与制度中的地位相联系的“符号资本”、通过家庭与教育系统形成的“文化资本”等概念,^①从而把意识形态教育很自然地内化到日常生活与教化中,使理论对现实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性。追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渊源,除马克思的原著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其重要的学术源泉。^②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紧密,但相关研究还是应跳出理论的局限,将拓展借鉴的理论范围与得出自身独有的理论相结合。因此,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与理论都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

3.信息有效传播之需要

如果传播实务想取得良好效果,那么其所依托的理论就既要能内化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又要能紧密结合人性本身进行阐发,做到入心、入理、入情,如儒家思想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智、信、圣、仁、义、忠”以及《三字经》《增广贤文》,其观点或思想既能内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又能依托人性讲述事理,让接受者觉得入心、入理、入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信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找能把两者有效结合的理论之路。

① 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第1版[M].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② 曹晋.导论[M]//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二)建构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切入口及方法思考

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作者采取知识谱系的研究结构与“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研究理念,指出了建构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说的研究切入路径及应遵循的研究理念。只有扎实推进,才能形成适合自身的厚重又科学的理论。

1.找准三种研究切入口

一是以知识谱系的结构进行整体分析。这种研究适用于“照着讲”,可以清晰呈现不同分支的研究情况,如《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运用该结构很清晰地向读者介绍了该研究的谱系及学术状况,读者通过目录能对该领域研究有纲举目张的结构认知,进而可以具体研读学术分支的内容。在我国开展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时,亦可以先列出知识谱系再展开研究,进而形成系统性的理论。

二是从宏观视角着手,研究传播、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之间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几者之间的关系与运作机理的探索应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石,其他具体的分支研究则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莫斯可(Vincent Mosco)提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很简明,即对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所有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方式、自己的仪式。^①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会在自己的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方面考虑“传统”“建构”与“仪式”问题,并主动或被动地让各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将复杂的关系与运行机理研究清楚是学者的首要任务,其他的分支研究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出的花朵。

三是从微观视角着手,从某一具体理论或思辨角度展开分析。如《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谈到了以民族志、女性主义及种族研究作为思辨视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可以从框架理论、镜像理论、集体记忆、集体遗忘这些具体理论角度分析我国的传播、政治、经济是如何作用于其中的。微观视角的研究既利于用挖深井的方式探幽入微,使问题得到深入分析,又可以在理论依托下对具体的分支领域或现象进行专心剖析。

2.紧扣“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理念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研究方法简洁实用:“照着讲”能清晰

^①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版[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地呈现学科已有的或深刻或残缺的研究现状;“接着讲”则为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学术研究不能只“照着讲”,还要有延伸与扩展;“对着讲”则是指在反思批判中接受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在当今我国的人文学术界尤为缺乏。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是新事物,在引进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中国化研究中更应采取这一研究理念。《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严谨遵照这一研究路径,其研究态度与思路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一是“照着讲”。在引进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中国化研究时首先要做的是“照着讲”,知识理论方面的“照着讲”在我国依旧是短板。首先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习并翻译讲授相关理论,严谨尤为必要。例如从现有多种版本的传播学教材来看,对于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生卒年标注多不一样,四人中离世最早的距今也只有60年左右,应该很容易在考证后统一生卒年,可见相关学术研究的不严谨。要先扎实做好“照着讲”工作,正本清源及掌握理论基础之后才能“接着讲”。

二是“接着讲”。“接着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西方理论后的自我理论建构。建构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西方理论“照着讲”的基础上思考中国环境以进行“接着讲”。可以借鉴西方理论建构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思维逻辑等,然后联系中国传播政治经济现实环境进行理论的中国化,不能直接绕开“照着讲”这一阶段,否则会缺乏理论根基。

三是“对着讲”。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进与中国化研究中,“对着讲”是建构自身理论的必要环节,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对“研究土壤”的依赖与学术独立。文科学术研究与理科不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只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文科研究忌众口一词,也多无唯一答案,加之中西方在体制、文化上的差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表现也是不同的。亨廷顿把文明分为七种,其实主要差异还是在东西方之间,因此,“对着讲”不可或缺。莫斯可认为传播与社会联系紧密,应注意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我国的新闻传播与文化及政策的联系更为紧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应该是研究政策与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总而言之,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应以理论对照与环境对照相结合进行“对着讲”。

3.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化路径的具体方式探析

要建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应从学术精神、理论自觉以及研究对象的学术特征三个方面切入,这样才能建构起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路径并不复杂,问题的关键正如《北美传播政治经

济学研究》一书的作者所说的:学术研究应考虑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害。以学术为志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既然选择以学术为业,就要为纯粹学术献身。^①只有学者具备这种学术精神,学术标准范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才能逐渐确立自身的地位。从现有西方相关研究来看,相比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聚焦于四大基石: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实践。^②上述研究重点依然属于中国化路径上的研究内容,但使其紧密联系我国的权力、政治、经济与新闻传播研究则是当务之急,也是重起炉灶建构理论的基石。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作者通过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内容的分析,得出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几点启示:(1)要建构中国传播研究的主体性;(2)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坚持现实主义认识论,批判与建言并行;(3)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参与到媒介改革运动中。作者认为要破除西方传播研究的美国中心论,建构中国传播研究的主体性,就要促进中国传播研究路径和视角的多元化。^③这指出了中国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所在:传播、政治、经济三者虽有共性,但更有各自所依附的制度带来的差别,因而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必须要有主体性意识。另外,只有紧密结合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才能实现理论自觉与研究的主体性。正如政治经济学者所提醒的那样,传播学如果只是模仿社会学和心理学,就永远不会成功。^④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研究路径上,所应研究的内容与对象前文已经提及,但在这一过程中更应重视权力、政治以及政治体制下的经济体制对传媒产业与内容消费市场的影响,几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机理是研究的重点,也是该领域研究的基石。青年学者陈世华在著作《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说:“正如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样,中国的传播研究要研究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与资源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将传播系统视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媒介、政府、国家与传播工业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传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⑤这直指中国化研究应围绕的核心主题。

结 语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厚重的社会现实土壤及分析问题的思辨深度,理应成为该学科

①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74.

② 曹晋.导论[M]//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

③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58.

④⑤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63.

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实际上却处于边缘地位。在我国,其依托的现实土壤更为丰厚但相关研究更为缺乏,青年学者陈世华是在该领域持久潜心研究的典型代表。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并得到应有的地位。另外,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当务之急是解决“照着讲”的问题,“接着讲”与“对着讲”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与目标。

〔李铁锤,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陈艳辉,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特约编辑:顾 洁〕